



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研究

高考改革研究丛书

刘海峰 主编

刘清华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03JZD0038）资助

高考与教育教学的 关系研究

高考改革研究丛书
刘清华 著

刘海峰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研究/刘清华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0

(高考改革研究丛书/刘海峰主编)

ISBN 978-7-5622-3629-0

I. 高… II. 刘… III. 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研究—中国 IV. G647. 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6201 号

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研究

◎ 刘清华 著

责任编辑:吴兰芳

责任校对:罗艺

封面设计:甘英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督印:章光琼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印张:16.5

字数:279 千字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次: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33.00 元

总序

1977年恢复高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不亚于1949年以后的许多历史事件。恢复高考30年来，高考在促进中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民族文化水平和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平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高考的公平竞争，为高等学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的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我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腾飞，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

高考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本的教育考试制度。作为中学与大学之间的桥梁，高考不仅对中学的教育和教学，大学的新生选拔具有调节与指挥作用，而且承载着整合教育系统，维系社会稳定的重大责任；它上关国家安定和民族前途，下系青年学生的个人命运和千家万户的喜乐哀怒，因而历来是中国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尤其是当这种大规模选拔性考试在长期实行及利弊得失都充分显露出来以后，更是受到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然而，当今人们对于高考这么一项影响重大、万众瞩目的重要制度的看法见仁见智，总体而言是“三多三少”，即新闻报道多，理论研究相对较少；一般议论多，深入分析相对较少；零星探讨多，系统研究相对较少。由于高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制度，站在某一种特定的立场去评说，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去观察，可能所见都是事实，所言也都有一定道理，但也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情况。因此，在评价高考时，重要的是应全面和客观，而要理性地、全面地评价高考，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就应该对高考作深入的研究。

对我国高考的理论研究，以往与许多国家一样，多偏重于考试技术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考试的科学性问题的研究。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高度重视考试的国度里，类似于高考这样的大规模竞争性考试所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考试的技术性问题，而更多的是考试的社会学问题。因此，国际教育评价协会每次年会多注重考试的科学性问题，但1996年9月，国际教育评价学会在北京举办的第22届年会选定的主题却是“大规模考试的作用及相关问题研究”。世界各国的大规模教育考试都有强大的评价和筛选功能，也各有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不过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它不仅是一个考试古国，而且是一个考试大国。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学招考只是一种测量手段，只是引起小范围的关注，只是部分人关心的话题。然而，受传统和现实的制约，中国人却将高考变成了文化，变成了经济，变成了政治，变成了盛大的仪式，变成了一种各方面关注的社会活动，变成了一种惯例式的全民动员。在有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和千余年科举考试历史的中国，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和城乡文化教育水平差异很大的中国，在民众高度重视甚至是过度重视教育的中国，高考既有与世界各国的选拔考试相同的规律，也存在不少独有的现象和问题。

高考改革是一个谁都说得上两句的话题，同时实际上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要谈谈自己关于高考改革的观点，发表一两篇文章不难，而要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发表不重复的系列论文却很难。目前还很少有专门的高考改革研究专著，更没有成系列的高考改革研究丛书。为了将高考研究推向深入，并为现实高考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撑，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特组织编写了这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

作为中国高考研究的重镇——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尤其是以院为依托的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长期以来将高考改革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全国和部分省市的高考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在我历年指导的众多博士论文中，以高考研究为选题的占大多数。要想真正为高考改革提供参考，我们的研究应建立在对招生考试历史与现实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为了使博士论文的写作不至于陷入空谈，我总是要求博士生多了解高考实际。近年来，每位以高考为选题的博士生都要到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实习，在每年的七八月间参加该院的录取入围工作，真正深入到招生考试第一线，多与考试管理工作者接触交流，才不会太书生气，所写论文才能脚踏实地。每个人的研究各有专攻，但希望都能切中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做到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本丛书是我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由我自己的著作和历年指导通过答辩的高考研究博士论文为基础构成。欣逢全国上下都在纪念高考恢复和议论高考改革问题，本丛书的出版算是为纪念高考制度恢复 30 周年献上的一份薄礼。

刘海峰

2007 年 8 月 6 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高考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	(1)
第一节 高考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	(3)
第二节 高考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3)
第三节 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问题	(4)
第二章 高考与教育教学关系的历史研究	(10)
第一节 科举时代“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10)
第二节 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25)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36)
第三章 高考与教育教学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	(60)
第一节 高考目的与教育目的	(60)
第二节 高考过程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66)
第三节 高考结果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79)
第四章 高考与教育教学关系的应用理论研究	(91)
第一节 高考与应试教育的关系问题	(91)
第二节 高考与素质教育的关系问题	(101)
第三节 高考与会考的关系	(114)
第五章 高校招生考试与教育教学关系的国别比较研究	(124)
第一节 美国高校招生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124)
第二节 日本高校招生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139)
第三节 英国高校招生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153)
第四节 法国高校招生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166)
第五节 德国高校招生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183)
第六节 国外高校招生考试的共同特征	(192)
第六章 结语 高考改革的基本思路	(204)
第一节 高校分类发展与高考制度改革	(205)

第二节 高校招生考试评价体系改革	(215)
第三节 深化高校招生机制改革	(232)
第四节 价值观视野下的高考制度变革	(239)
主要参考文献	(250)
后记	(259)

第一章 导论：高考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

放眼世界各国，今日的考试包括高校招生考试具有极高的合法性，正如英国学者罗伯特·蒙哥马利所说：“考试已经这样稳定地站定了脚跟，要废除它似乎比取消篝火节或者圣诞节更无可能。”^① 同时，废除考试这种极端的言行如今已经很少了，但对考试措施的批评以及改革建议时有所闻。

据研究揭示，美国的 IQ 测试从 20 世纪 20 年代就开始受到抨击，其中不但有种族歧视问题，更有类似我国对“应试教育”的批评。斯达特门在为 1979 年的《教育测验法》所做的准备陈述中指出：“标准化考试只是用来证明中产阶级子女的成绩。它使工人阶级的子女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前景暗淡无光。以性向、能力或智力等术语进行的测试事实上只证明了一种价值和家庭背景。”斯特安钮在 1981 年出版的《测试陷阱》中，对“能力本位主义”遮盖下的阶级利益和社会权力进行了全面的揭示。20 世纪末理曼在《大考试》中对 SAT、ACT 作了考察，认为它们对美国中学生的深刻影响有如我国高考所具有的效能^②。日本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考试地狱”之说，其后改革不断，但分数主义教育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儿童从进小学那天起就开始为升大学拼命努力学习，一些“私塾”更是大量出现，这些“私塾”一是文化补习学校，二是升学预备学校，结果形成了所谓的考试产业。欧洲国家高校招生一般施行资格考试制度，升大学看起来很轻松，其实问题同样很多，不但“文凭病”与考试教育现象大量存在，而且儿童面临过早分流的缺陷。这种多轨制的教育制度及相应考试制度导致的结果，一般也是中产阶级家庭中的成员或者拥有较多政治、经济、社

^① 罗伯特·蒙哥马利著，黄鸣译：《考试的新探索》，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76 页。

^② 周作宇：《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5），第 86 页。

会、文化资本的幸运者居多，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从法国会考中看得十分清楚^①。

抛开他国高校招生考试问题不论，由于发展水平与文化心理差别很大，我国高考改革也许面临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从考试研究的角度，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问题：一是考试的社会学问题。它涉及考试与外部诸因素的关系，如考试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与教育、教学的关系等。二是考试的认识论问题。主要是考试与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如命题、评卷、统计分析等。三是考试的管理学问题。主要是考试实施管理问题^②。

高校招生考试（简称高考）不只是考试，还有录取环节以及对整个高考系统的管理环节，例如，当前高考中的“择优录取”问题，录取分数线的区域公平问题，由考生状告教育主管部门引出的招生中的“依法治招”问题，如此等等，皆说明对高考的研究，虽然同样可以划分为与上述3类问题相似的问题，但就高考而论，无论是实践表现还是理论研究都更为复杂。这说明我们有必要把近、现代意义上中外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作为专门的对象进行研究，总结出高考活动的基本规律及原则，以期直接指导高考改革实践。

在中国长期的考试历史中，考试认识论的水平，决定了考试质量的高低，而考试社会学的是非，却决定着考试的存废。在西方的考试理论中，考试认识论的著作比较多，而考试社会学的论述很少见^③。在我国，则是各方面的理论研究都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例如，从科学的角度对考试进行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本《考试学》专著（廖平胜、何智雄、梁其健著）诞生于1988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而有关高考社会学理论的专门论著，至今已经出版的不过寥寥几本，如由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考试与教学》（贾非著），由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考试制度研究》（贾非著），由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大规模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研究》（张宝昆著）。专门从历史视角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专著则只有《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刘海峰著），由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① 刘清华、李占伦：《会考：法国社会关系结构再生产的关键机制》，《考试研究》，2006（3）。

② 杨学为：《中国需要“考试学”》，《中国考试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③ 杨学为：《中国需要“考试学”》，《中国考试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高考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涉及高考与外部诸因素的关系，如高考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与教育、教学的关系等。这些基本问题研究，事实上还不能满足高考改革实践的需要。

第一节 高考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

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历史的视角，研究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它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例如，《恢复高考廿年——兼论高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杨学为，1997），《高考改革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刘海峰等，2002），都谈到高考受制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同时高考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产生了积极的主流的作用，目前的高考改革要充分考虑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作用，不可轻率行事^①。但“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高考的录取率问题”，“高考与社会分层问题”，“高考的政治经济功能问题”，“国际化背景下的高考产业问题”，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二节 高考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这方面，《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刘海峰，1995）和《再论传统文化与高考改革》（刘海峰，1996）提醒我们要注意高考改革的文化制约因素，它关系高考改革的可行性问题，如统考的存废问题、“宽进严出”问题等^②。“高考与当代文化创新问题”，则关系到高考改革的观念与价值问题，《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冯增俊，2001）一文，则提醒我们要以创新文化作为高考改革的出发点^③。遗憾的是；有关高考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

^① 分别见杨学为：《恢复高考廿年——兼论高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中国考试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393页；刘海峰：《高考改革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发展研究》，2002（6），第34~38页。

^② 刘海峰：《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再论传统文化与高考改革》，分别见《上海高教研究》，1995（3），1996（1）。

^③ 冯增俊：《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12），第26~29页。

第三节 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问题

从教育的目的看，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应该说是高考与其他外部要素关系的核心，因为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在高质量的高中教育基础上，高校就可能选拔到更为优秀的人才，从而大学教育才可能有较高的新生质量起点；高考尽可能反映高校教育目的的要求，高校就会选择到适合自身培养目标要求的新生，这有利于高等教育目的的实现，并最终带动、促进、激励高中教育的发展。高考作为一种选才活动，自然要尽可能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即有利于育才，如此，才可能最终促进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

在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问题上，如今基础教育中有关“应试教育”的文章，可谓是汗牛充栋，在轰轰烈烈的批评应试教育的观点中，其矛头往往就是直接指向高考。高考被认为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最大障碍，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中，个性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往往也是高考。正是上述这些原因，高考与教育的关系是目前需要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这里，我们不妨以几个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来具体揭示这个问题。

观点一，2002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先生，从历史的视角，在《广西今年的高考改革——暨纪念全国统考五十周年》一文中认为，自1952年6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以来，全国高等学校实行统一考试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来，高考遇到的重要矛盾有：政治与业务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大学招生与中学教育、教学的矛盾。兹转述有关内容如下①：

关于政治与业务的矛盾，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党的“左”倾错误的发展，高考被扣上“资产阶级政治挂帅”、“智育第一”的帽子。1966年，废除高考成为教育领域“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上大学成了“白专道路”、“扩大三大差别”、“复辟资本主义”。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领导下，恢复高考，择优录取，同时批判了政治审查工作中“左”的错误。1978年，邓小平同志又专门论述了红与专的问题。至今二十多年来，政治与业务的矛盾已经解决。

由于高考是大规模笔试，所考查的知识、能力偏于书本上的，实验也

① 《中国教育报》，2002年5月17日。

是在纸上写，不利于中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文革”期间，毛泽东同志要求“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在“四人帮”的操纵下，导致否定理论，否定书本知识，禁止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恢复高考后，基础理论重新得到重视，但碍于大规模笔试，考查动手能力的问题虽比“文革”前有所改善，但始终没有得到基本解决。

关于共性和个性的矛盾，1952年全国统考后至1956年，每年统考前都发生一场“统考好还是学校单独招考好”的争论。由于统考节省人、财、物力，节省时间，特别有利于重点大学从全国各地选拔优秀新生，所以，每次争论的结果都是坚持统考，而加以改进——主要是兼顾各不同类别高等学校的特点，如艺术体育类、文理类，以及体现考生的志愿。恢复高考后，改革录取体制，由于高等学校负责录取、省级招办监督，实行以志愿为主的投档办法，建筑系加徒手画等，都是在继续解决共性与个性的矛盾。但总的说来，仍然是统得过多而个性不足。这种状况，不利于选拔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的多种人才，不利于培养创新精神，不利于拔尖人才的成长。

至于大学招生与中学教育、教学的矛盾，自1963年教育部提出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以来，可谓愈演愈烈，九十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部进一步提出克服“应试教育”，实施素质教育，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基本状况恰如有人形容的那样“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

观点二，1997年胡中锋、董标、李方在《我国高考的回顾与反思——兼论构想“新高考制度”的出发点》一文中，从历史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考制度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其中除了高考过程的欠科学性问题，即科目设置及所考科目的权重问题，高考的效度、信度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好以外，论者着重提到的两类问题，主要是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问题。兹介绍如下^①：

一、高考导向的片面性

论者认为高考的片面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现行高考重智，轻德、体、美、劳，基本上属于“智力中心论”。就此而言，它很像教育史上的“形式训练说”的再现，造成教育过程的偏向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学生整体素质发展的片面

^① 胡中锋、董标、李方：《我国高考的回顾与反思——兼论构想“新高考制度”的出发点》，《江西教育科研》，1997（4）。

性。其二，就智育而言，现行高考重知识轻能力，基本上属于“知识中心论”。其又像是“实质训练说”的贯彻执行，因而对教育过程的导向必然是重知识轻能力，进而又造成学生智能发展的片面性。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建立一个以学科检测为主，以全面考核为辅的多元化高考制度”，另外就是高考方法的局限性，忽视或没有很好地测试学生的能力。

二、高考结果的残酷性

论者认为由于诸多教育及社会的原因，高考竞争的结果无非两个：一部分人“金榜题名”，从而成为“天之骄子”，社会的“宠儿”；另一部分人“名落孙山”，成为家庭乃至社会的“包袱”，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因此，追求“金榜题名”成了考生及家长的唯一目标。当然，竞争也具有合理性，它激发了人们的竞争精神，焕发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增强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观点三，2000年韩广才、符永宏、兰登明在《我国高考招生制度的问题透视》一文中，专门对现行招生制度的利弊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其中主要的是有关高考与教育的关系问题。现将有关招生制度弊端的论述转述如下①：

（一）不能完全实现选拔人才的功能，科学性和完整性不足

以单纯文化课知识为主和“一次考试定终身”，有时并不能正确衡量一个学生的全面素质，“高分低能”和“漏才现象”在所难免。因为教育考试基本上测量的是带有共性的内容，难以考查学生的个性品质。在教学大纲中列出的知识、能力方面的内容，有些是要教但不考的，有些是教学中要培养但无法考查的，如科学态度、学习兴趣、探究能力等。在我们另外的调查中，也发现有类似有趣的印证。如在中学生回答“您心目中素质全面的学生在班级中的文化课成绩排名一般处于什么位置？”时，只有15.38%认为是前5名，有28.85%的人认为是前10名，而多达50%的人认为在10名~25名之间。在大学里，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高考成绩较低的同学各方面表现出色的现象比比皆是。

（二）破坏了对中学教育正确的导向作用，严重阻碍了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

高考指挥棒巨大的牵动效应倾向于构建一个应试教育体系，而应试教育带来

① 韩广才、符永宏、兰登明：《我国高考招生制度的问题透视》，《江苏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的弊端是多方面的。表现有：①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导致应试教育的畸形发展。中学一切工作以考试和升学率为中心来安排，考什么，教什么，把系统的学科变成孤立的知识点、能力点，又在知识点上提高标准，反复练习，最终形成所谓“深挖洞”式的教育结构和学生片面的知识结构。②阻碍了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为了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学生成了考试的奴隶和题海中的机器人。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文化艺术素养、体育运动水平等均得不到有效的培养和提高，这样的学生没有个性，没有特长，没有业余爱好，是书呆子。而且升学的期望成为学生严重的精神负担，身心健康受到损害。③难以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高中教学不仅要教会学生应掌握的知识，而且要教会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在应试教育的泥潭里，学生只能被动、机械地死记硬背现成的知识，难以生动活泼地学习，创造力受到极大的抑制。④在应试教育的阴影下，造成中学教育思想以及教学内容、方式的严重封闭和固化，对任何形式的教育教学改革产生排斥和阻碍作用。

三、现行招生制度也给高等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高校专业志愿的盲从和就业的供需矛盾；应试教育的超负荷运行暂告结束，“减负”心理与大学的教育管理要求的矛盾；短线专业过度热门、长线专业备受冷落与招生计划国家下达的矛盾都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留下了后遗症。现行招生制度中，高校实质上未获自主权，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在招生上并未体现，考生自主选择权未受尊重。

观点四，2001年冯增俊在《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一文中，分析了全国高考制度的利弊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还是高考与教育的关系问题①。

该文指出，一个国家的教育，只有以创新作为保存、选择和传递文化的出发点，激活并实现保存、传递和选择这三种教育功能的形式创新，才会是最具有活力的，也才会使民族文化充满创造性，从而对新挑战作出创造性的应答，使国家兴旺发达。全国统考制的影响在本质上与科举制读13经并无大异，它虽有一些作用，但其要害就是统一，强调“一刀切”。这种统一泯灭人一生中最有创造性年华的发展，让富有想象力的学生沉湎于死记硬背和冗长繁琐的揣摩求证之中。

第一，统考制实际上也是强行要求全国数百万学生（实际上影响到一亿多

① 冯增俊：《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12），第26～29页。

名中小学生)都按照一个步调受教育，都只能读同样的书，用同样的方式教学。这在世界知识日新月异，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层出不穷的今天，仍施行此等教育方式，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统考制度的目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公平全面地选拔最优秀的学生，但这种做法在本质上却限定学生只能按照一种思维模式来进行思考，极大地扼杀了儿童的创造性。统考中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是一把无情的大钢刀，冷酷地截断了儿童的一切灵性和好奇心。

第三，统考制度是应试教育的土壤，助长了各种偏科、片面追求升学率、把分数凌驾于一切教育活动之上，而不顾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人格的健全发展；也是造成弄虚作假，押题猜题，把人生的希望都押在分数上，赌在一次高考之上的根源。

第四，统考制度断送了教育科研的生命，迫使教育科研成为统考的附庸，为统考服务，任何研究都不能越过升学率一步。

上述观点的简要罗列表明，在高考改革面临的种种问题中，高考与教育的关系问题特别为世人诟病。事实上，几乎凡是论及高考改革的文章，都免不了要谈到学校教育，至于谈到“应试教育”的文章，更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然而，在有限的理论研究中，大量的学术批判虽然有利于建设性意见的出现，但终究代替不了建设性意见。同时，现实中只重视研究高考与高中教育的关系，或者只重视研究高考与高等教育的关系，都不利于解决好高考与高等教育、高中教育三者间的关系。这也就是本书在诸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中，选择研究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即研究高考与高等教育、高中教育关系的原因。

英国学者罗伯特·蒙哥马利说：考试的影响在英国是如此深远以至只有历史学家的探索才有助于弄清楚这个复杂的问题^①。我国也许同样如此。为此，本书首先从历史的视角，尽可能借鉴历史学家的观点，对高考与教育的关系作一简要勾勒，使高考改革以史为鉴，使当前的高考改革之路能够更为平稳。

考试制度调整的过程，便是检验坚持标准的过程^②。高考制度调整的过程，也同样是检验坚持标准的过程。这就有必要分析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基本理论关

^① 罗伯特·蒙哥马利著，黄鸣译：《考试的新探索》，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译序部分第3页。

^② 罗伯特·蒙哥马利著，黄鸣译：《考试的新探索》，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系，使高考的标准与教育的标准尽可能协调，把冲突尽可能减少；使高考的过程尽可能兼顾高等教育、高中教育的需求，兼顾教育及社会的需求，兼顾不同素质的需求及不同考生的需求；使高考的结果对教育具有尽可能好的反馈，进而在社会舆论上有一个良好的导向，在教育教学发展上有一个正确的导向，以减少或降低高考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如何使高考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如何寻求高考系统与教育系统的良性互动，需要从基本理论上进行说明。

高考改革也许是管理者的“爱好和职业前程所指引的方向”，所以当他们面对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情绪化的声音时，改革就容易出现急躁与盲动，尤其是出现对教育的误导。若希望高考改革的过程避免盲动，就需要清除改革者眼睛里的障碍物，从实践层面处理好高考改革与教育的关系。这就需要从应用理论上辨明高考与应试教育的关系，与素质教育的关系，与会考的关系，找到高考改革的合法路径。

“教育要面向世界”，“教育研究也要面向世界”。所以，笔者在对国内高考与教育关系做了初步研究的基础上，也试着把眼光转向国外的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看看他们高校的招生考试与教育教学是什么关系，有些什么共同特征，以期能为我国高考改革提供经验、教训。

提到“改革”这个词，理论家的眼睛就会发亮起来。因为，它虽然难下定义，却意味着进步和改进是必然的前景^①。这种警示比较中肯，因此，在以上所有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提供了一种高考改革的宏观思路，严格地说，它只是处理与教育关系的宏观思路。我想，这是高考改革的核心。高考的社会功能的发挥，需要通过高考的教育功能起作用。一个没有教育效益的高考，往往也是没有社会效益的。寻求高考与教育的关系，也首先是为了“不舍本逐末”。换句话说，可能任何高考改革，都需要尽可能有利于提高教育的质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研究，重点在于较为宏观地、系统地探讨高考与高等教育、高中教育的关系，书中涉及与教学的关系，主要是就“教育途径或手段”意义上的教学而言的，而不是较为微观地探讨高考与各科教学的关系。关于后者，国家“八五”科研子课题，已经涉及高考与高中教学关系的研究，并出版了各科《考试说明》（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3，1994，1995，1996）等书。

^① 罗伯特·蒙哥马利著，黄鸣译：《考试的新探索》，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第二章 高考与教育教学关系的历史研究

中国是考试制度的故乡，古代的科举考试曾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西方现代文官考试制度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代的学校考试制度是伴随西学东渐、科举制的变革而逐步形成的，但逐渐本土化的时期主要在民国时期，其间的单独招考、统一招考、实行会考制度等实践给今天留下了许多经验与教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简称高考）进行了制度化建设，创立、废除、恢复与改革的历程，同样有着诸多经验与教训。所以，探索高考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无疑可以为当前的高考改革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使高考改革有利于中学的育才、大学的选才。

第一节 科举时代“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一般认为，隋炀帝大业元年进士科的设立是科举制起始的主要标志，它开创了中国选举制度史上一个新时代——科举时代（公元 605—1905 年）。

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公务员考试，它是联系教育与仕途的纽带，其目的是选拔从政人才。高考是高校新生的入学考试制度，它是联系高中与大学的纽带，考试的目的是获取高校入学资格。但绵延了 1300 年的科举，与高考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一，两者都是竞争性的选拔考试，采用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方式；其二，两者都是国家考试，由国家举办；其三，两种考试都有严格的考试程序，如考试所实行的编号、闭卷、弥封、监考、回避、入闱、复查等；其四，科举与高考的作用与影响都有两面性，似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上述意义上，“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①。从科举看高考与教育的关系，也就能从科举考试与教育的关系中得到规律性启示。

^① 刘海峰：《科举存废与高考存废》，《高等教育研究》，2000（2），第 39 页。